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7

中央文献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F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文献出版社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7—1931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ЕВ

МОСКВА, 1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5073-1168-6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史料—中国—1927~1931 ②共产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史料—中国—1927~1931 N. ①K260.6 ②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269 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田松年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 开 18.5 印张 45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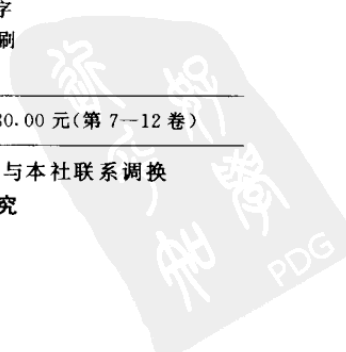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73-1168-6/K·561 定价:280.00 元(第 7—12 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益涛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M·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B·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三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413份，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和电报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等领导人的讲话。从内容上看，涉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制定和实行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的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还有很大一组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制定和实行中共向武装斗争转变的方针时所起的作用。本卷文件集全面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1927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活动情况的文件，其中一些文件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本卷文件集还发表了米夫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与前两卷相比较，这一卷的

最大特点是，收录了较多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的报告和函电。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8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9年底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4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7、8、9、10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0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做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明其姓名全称。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三卷和第四卷^①所收集的文件阐述了从1927年7月，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新的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主要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这些文件也略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确立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制度，代之以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中国红军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在中国，主要在中国农村实行这一政策而展开的过程，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文献中被称为“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1933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和苏联地位发生的巨大变化，即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侵略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失败，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对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尽管为时很晚。这次审查是根据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斗争策略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七大后对华政策新方针的探索和在实践中向这种方针的过渡，由于

^① 系列文件集的前两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年版；第2卷（1926—1927），分一、二册，莫斯科1996年版。

一系列原因持续了比较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最终并正式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在1937年4月，而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则只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才实际形成。考虑到这些情况，系列文件集的编者把第三卷和第四卷冠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总称，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共产国际七大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取消苏维埃口号和终止国共之间的内战。

在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或初期（从1927年7月至1931年底），从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各派的头几次武装发动和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到建立较大的和较稳定的苏维埃根据地并在华中和华南统一红军。在这个时期里，制定了中共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和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在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11月）的决议中有所反映。

第二个时期，从1931年底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至8月），代表大会快结束时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的计划已告失败（华中和华南主要苏维埃根据地丧失，红军主力被迫向西北转移，损失惨重），进一步明确了中共、苏维埃和红军活动的基本方针，未作原则性修改，初步确定根据策略决议开始局部审查对一些地区军政集团的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在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的同盟军的“隔绝状态”。

第三个时期，从共产国际七大后到1937年8月，其主要特点是探索从“苏维埃化”的政策向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考虑到这样的分期法以及现已发现和挑选出来的文件的数量和意义，我们决定将属于制定和执行苏维埃政策的第一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入第三卷，而将属于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

人第四卷。

总的说来，中国“苏维埃化”的方针乃至从共产国际七大开始的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前一时期特别是1926年底以来执行的政策的继续（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前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对革命的民族任务和社会任务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就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是在1927年夏，即莫斯科和中共同武汉国民党关系破裂时期，提出通过“平民途径”，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的联盟发起革命的进攻来“继续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的方针，这一方针反映了对结成这一联盟的可能性、对工农运动的水平和性质的过高估计。

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的提出是由以下理论依据决定的：在共产国际的政治理论宝库中，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建立革命后政权体制的其他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斯大林的名字直接联系着的，他在同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后于1927年秋亲自批准了这一方针，而托洛茨基早在这年春天就要求在中国组织苏维埃。

在1927年至1937年整整十年间的时期里，尽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其环境、内容和形式来说有时有着十分重大的差别，但对一些决议的性质及其实施的机制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苏联和联共（布）的内部发展进程，即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个人独裁的确立和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20年代末，伴随着这些发展进程，先是在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对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左倾”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后是在1928至1929年间发生了在反对“右倾分子”和

“右倾调和分子”的口号下对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随着布哈林的被排挤，共产国际和加入共产国际各党的主要政治和干部问题的解决就集中在斯大林及其亲信莫洛托夫的手中了。

在联共（布）领导层中和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决定中国问题的人员范围急剧缩小的趋向从1928年初就显露出来了。这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机关渠道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发送给联共（布）领导人的名单的缩小中可以看出。现在没有发现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在1928年3月以后继续活动的材料。从1928年初起，审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中共活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数的减少也反映了这一趋向。如果说1927年下半年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都审议这些问题，那么在整个1928年中只有8次，1929年只有2次，1930年只有1次，而1931年则没有。1930年以后，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会议上不再审议中国问题了，代表团的工作失去了经常的性质。

关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的制定工作表面上转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东方书记处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实际的决策机制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要把寄给中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干部问题的决定和指示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或者征得他们的口头同意，而事先又要征得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的同意。从20年代末起，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最有影响但不是独立的人物是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不再作出记录在案的决议的这种“自我放弃”的现象，也反映了联共（布）领导的一种意向：经过1927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以后，它不愿保留自己行为的文献证据，以防遭到新的

挫折。下述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1927年以后，斯大林再没有发表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或公开讲话，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或者在会见中共代表时对国内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述。

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共产国际活动中教条主义也加强了。布哈林及其拥护者被解除共产国际的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所属的科研教学机构内，在东方学界，在论述中国和中国革命当前迫切问题（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关于孙中山的阶级本质、关于陈独秀主义的本质）的中国学杂志^①上，即使过去也仅限于发表官方的评价，而在30年代初则代之以严厉的批判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贴标签、政治谴责和迫害。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第一次镇压浪潮，主要触及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机关内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师和学生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拥护者，以及在工农红军学院里任教的军事专家中的一些东方学者和中国学者。30年代中期，基洛夫遇刺后，在共产国际机构内开始进行逮捕。被逮捕的有东方书记处的负责人萨发罗夫、曼达良，还有在东方书记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中国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人员。这次逮捕是1937至1938年大镇压浪潮的序幕，在1937至1938年的大镇压浪潮中，被逮捕和处决的有在共产国际机构、中国研究所、共产国际执委会院校、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军事机关、苏联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中工作的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环境，被指控为“左”倾或“右”倾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对“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的清查，这一切都为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分析和执

^① 见B.H. 尼基福罗夫：《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莫斯科1970年版第170—176、180—188、209—218页。

行莫斯科对华方针的后果打上了烙印，表现为试图挑选一些事实并加以诠释，以此来证明“领袖”所批准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用各种“主观原因”，即在当地实行这一政策时所犯的错误或在共产国际机构及其驻中国和中共的工作人员中的“倾向分子”和“敌对分子”所搞的“阴谋”来解释它的失败。

然而，对所执行的政策的总的的基本原则表示怀疑是危险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并没有排除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根据“中等水平”结论来综合有关中共及其所成立的苏维埃和红军部队的活动情况的大量通报材料的积极工作。中共实际活动的需要，中共党内和它的一些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要求这样做。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研究所一起制定了共产党政策的基本方针，即农村土地政策、工会政策和军事政策，以及城乡群众性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方针。

就像上一个时期一样，在这项工作进行的同时，也试图将一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工作方式，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中来。与此同时，在总结和审查 20 年代末以来中共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和方针时，也表现出一种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状和中共活动条件的一些方面的倾向。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培养一大批在以往年代里有国内工作经验的专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活动中的这种倾向反映在对涉及农村土地政策、军事政策和军事建设途径的方针的修改上和对武装力量作用本身的理解上。在这方面最重大的修改是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政策作出的修改，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后作出的修改。

随着 30 年代中期形势的变化：由于西方和远东战争威胁出现而造成的苏联国际处境的复杂化，以及主观因素，即在国会纵火